

世事如棋局局新

——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

吴心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关键词〕 中美关系、新特点、发展趋势

〔摘要〕 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经历了迅速发展期、转折期、重新定位和获得新的发展期。当前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如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化和对称性的增强，双边关系的国际化，安全关系的复杂化，以及互动的强化和机制化。展望未来，国际环境和双边力量对比的变化将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一些新的议题将在两国关系的议程上凸现，中国对处理双边关系会更有信心、更加现实，而美国对华政策也会越来越务实。

〔中图分类号〕 D822.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 (2009) 1 期 0010—06

〔完稿日期〕 2008年11月20日

岁月如梭。自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美关系已走过了30年的风雨历程。在这30年里，国际形势天翻地覆，中美两国各自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美双边关系更如同一条奔腾的河流，越过深谷险滩，浩浩荡荡，蔚为大观。

中美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

自1979年以来，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双边关系发展的大环境、两国的相互定位、双边关系议程、互动的基本方式等呈现各自的特点。

1979至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前是中美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是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个阶段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背景是冷战持续并逐渐走向缓和以及中国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彼此有比较正面的定位：美国视中国为友好的非盟国，中国则视美国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伙伴。两国在战略上的共同利益和经济合作是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双边关系的议程基本上

是积极的，即通过密切的政治交往以及在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促进各自的国家利益。就互动态势而言，虽然中美两国在国力上有很大的差距，但由于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与苏联改善关系，中苏关系的改善比美苏关系的改善起步早，中国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也因此在和美国的互动中占据主动，对两国关系议程的确定有较大的发言权。在这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是：保持战略合作，加强经济合作，淡化政治分歧。

从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到1996年前后是中美关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是中美关系的转折期，其基本背景是，“六·四”风波使中美关系的政治支柱遭到严重削弱，冷战的终结又给两国的战略合作划上了句号。在此背景下，中美相互定位复杂化：政治上的对手，经济上的伙伴，战略上的非敌非友。中美关系的议程基本上呈现负面特征，一系列的分歧——人权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不扩散问题——使双边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中美两国的互动态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在确定双边关系的议

程上获得了主动,不断向中方提出要求,中国则处于被动状态,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努力以稳定和改善双边关系。这个阶段中美关系的特点是,由于“六·四”风波的冲击,中美关系处于冷淡和紧张状态,定位不明确,走向不确定,互动的不对称性上升。

自 1997 年迄今为第三阶段。这是中美关系得到重新定位和获得新的发展的时期。这个阶段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背景是,中国发展势头迅猛,综合国力节节攀升,而美国则试图建立单极世界和巩固其优势地位,同时又要应付新出现的各种挑战。克林顿政府在第一任期内经历了在人权和台湾问题与中国的两场较量后,重新思考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对之进行了大的调整。新的对华政策试图跳出“六·四”风波的视角,抓住中国正在崛起为 21 世纪大国这一主题,谋求通过接触政策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使中国融入现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接受其游戏规则,确保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成为美国的合作者而不是挑战者。1997 年和 1998 年中美元首实现了互访,其间两国元首发表的《联合声明》确认双方“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中美关系走出了“六·四”风波的阴影,实现了重新正常化,并在新的时空环境下得到了重新定位。克林顿第二任期内中美关系发展的特点是,双边交往增加,合作面扩大,两国关系的基调趋向积极,但中国在双边互动中仍处于弱势。

如上所述,世纪之交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冲击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小布什政府执政之初在新保守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思潮影响下,视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试图以战略上的遏制和经济上的交往来应对“中国威胁”。“9·11”事件和朝鲜核问题的再度浮现迫使布什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实行策略性的调整,将中美关系重新定位为“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这主要反映了美方在反恐和朝核问题上谋求中方合作的迫切需要,而应对中国崛起的新的战略思维在布什第一任期内仍付阙如。2005 年 9 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的演讲“中国向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提出要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标志着布什政府对华政策上具有战略价值的

新思路的出现,即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谋求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一支建设性的力量,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向克林顿政府对华思维的回归。在布什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在总体上呈上升态势,两国交往越来越频繁,合作面不断拓展,而中国在双边互动中的地位不断改善,两国关系的对称性增强。

观察这 30 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国际环境仍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说中国主要是从国内视角看待中美关系的话,美国则更多地是从国际视角看待对华关系,因此国际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外交议程的设定和中国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其次,国内政治也对双边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影响了彼此对对方的看法,以及对对方政策的制定过程。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还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第三,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中挥之不去的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美国对台军售问题、90 年代中期的李登辉访美事件和台海危机以及 21 世纪初中国的反台独斗争,都给两国关系的发展留下了重要的印记。第四,中美交往的深化和合作领域的扩大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动力。在 90 年代初,由于“六·四”风波和国际格局的变化,支撑双边关系的主要是两国比较有限的经济合作和国际合作,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明显不足。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美经济纽带大大加强,相互依存显著上升。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也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亮点。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越来越强劲,也越来越多元。

中美关系的新特点

当中美关系步入而立之年之际,它所呈现的一系列新的特点值得我们审视和思考。

首先是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化和对称性的增强。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而不断深化的。美国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经济的重要伙伴,中国在出口市场、外来投资和技术引进

方面对美国多有借重。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意义并不突出。美国发展对华经济关系的考虑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着着眼于中国未来经济潜力的成分。中美经贸关系的不对称性突出。但是经过过去 10 年的发展,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已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借重也大大上升。如今中国已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同时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以及第四大外资来源。此外,中国还是继日本之后美国第二大债权国。中国在帮助美国政府为其巨额财政赤字和收支平衡赤字筹措资金上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是美国巨额财政赤字的“重大平衡者”。不仅如此,中国持有大量美元资产使得美国得以维持较低的利率水平,从而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所展现的图景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相互依存,它在结构上呈现出多元性和不断增强的对称性。^[1]

其次是中美关系的国际化。中美关系的第一次国际化发生在 1972 年,当时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不仅结束了中美两国 20 余年的敌对状况,也开启了国际战略格局的中美苏大三角时代,中美关系因此而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不复存在,中美互动主要在双边和有限的地区层面上进行。但是全球化的发展催生了越来越多的跨国问题,解决之道端赖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另一方面,为反恐和伊拉克战争所困的美国也愈来愈认识到其力量的有限性。到了布什第二任期,美国决策者意识到,美国虽然是强大的,但却不是万能的,它无力独家应付它所面临的挑战,也无法完全按照它的意愿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不得不谋求国际社会尤其是主要力量中心的协调与合作。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及其在处理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负责任的态度,使美国的决策者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来解决它单独或共同所面临的挑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两国关系的外延向国际层面拓展和延伸。今天,中美之间频繁的外交互动越来越多地是应对双边关系之外的

国际和地区问题——从朝核问题到缅甸问题,从伊朗问题到苏丹达富尔问题。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中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2] 这标志着中美关系的重新国际化。

第三是中美安全关系的复杂化。冷战结束后,中美安全关系一度处于不确定的状态。1996 年的台海危机后,美国军方开始认真考虑在台海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对中国的军事关注上升。^[3]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为了遏制日益猖獗的台独势力,中国加快了军事现代化的步伐,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进一步引起了美国的警觉。自 2000 年开始,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每年(2001 年除外)都要发表一份《中国军力报告》,《报告》的主要关注点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状况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这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唯一针对单个国家定期发表的军力报告,在此之前,美国只是在冷战时期针对苏联发表过类似的报告。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警觉可见一斑。随着中国军事能力的提升,美国对华军事判断也日趋严峻。2006 年的《中国军力报告》断言,“中国的军事扩张已经改变了地区军事平衡。中国战略核力量的现代化、地基和海基战区阻断能力以及精确打击武器的长期发展趋势已经给该地区的现代军事作战行动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威胁。”^[4] 美国军方同年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更直言,“在主要的新兴大国中,中国是最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竞争的国家”。^[5]

显而易见,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引起了美国的战略不安定感。美国首先担心的是中国增长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其战略力量会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而保持这种优势乃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其次,美国担心它主导东亚地区安全事务的能力——包括干预台海事务的能力——受到挑战,而美国对本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一个显著特征。此外,美国还担心中国军事能力尤其是针对台湾的军事实力的增长,使大陆在两岸军事力量对比中处于优势地位,有可能造成中国领导人的误判,从而倾向于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由此,如何应对一个军事上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成为 21 世纪初美国安全战略、

军事战略的新的重大课题。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以及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将会继续稳步推进国防现代化,而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提升的负面反应——不论是吓阻还是防范——反过来又会影响中国对其安全环境和国防需要的判断,这些复杂的相互认知和安全互动正是中美安全关系复杂性的体现。

第四是中美互动的强化和机制化。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两国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这就需要两国之间开展越来越频繁的互动,并将这种互动机制化。这首先反映在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互动频率的增加上。据不完全统计,从 2001 年至 2008 年 12 月,中美元首会晤达 18 次之多,平均每年 2 次以上,而在 1991—2000 年间,两国元首会晤只有 11 次,平均每年 1 次左右。此外,从 2001 年至 2008 年 12 月,中美元首共通话 30 余次,平均每年 3 次以上,而在 1991—2000 年间,中美元首通话不到 10 次,平均每年不到 1 次。^[6] 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频繁互动,首先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和建立互信,培育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意愿。布什总统就多次公开表示对他和胡锦涛主席之间形成的良好的工作关系感到满意。此外,两国领导人的接触还能推动在一些棘手问题上取得突破,直接提供双边关系发展的动力,这是一般工作层面的接触所不能比的。其次是两国对话与交流机制的数量大幅上升。这些以对话、论坛和工作组会议等形式进行的交流机制——中方统计是 60 多个,美方统计是 50 多个——涵盖政治、经贸、军事、司法、科技、文教等诸多领域,涉及从航空到反恐、从食品安全到不扩散的广泛议题,参与交流的既有部长级高层官员,也有工作级别的专业人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战略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等,是众多中美互动机制中的亮点,在沟通彼此关切、推动解决两国间的分歧、扩大和深化两国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温家宝总理在评价中美日益增加的互动机制时说,“中美之间各种对话和磋商机制已超过 60 个,特别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机制,为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发挥了重要作用”。^[7]

中美关系上述新特点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和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中国经济能量的增大提升了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并减少了依存的不对称性。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使中国的国际联系更加广泛,影响不断扩大,从而导致美国在解决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谋求中国的合作。中国国防现代化的推进和军事能力的增强使其成为美国战略规划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美国决策者固然会加强对中国的关注和防范,但也会在处理对华关系特别是涉及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方面更加谨慎从事。最后,中美互动的强化和机制化表明中国在美国外交议程上地位的上升,中国对美国实现其国家利益目标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也给中美关系打下了鲜明的烙印:中美经济联系的加深本身就是全球化推动的结果;全球化所催生的众多国际和跨国问题导致了中美关系向国际层面的延伸;中美互动的强化和机制化则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外交的新特点,即相互依存的加深需要国家间通过更多的接触和沟通来协调彼此的利益,妥善处理交往中所出现的问题。

中美关系的走向

思考中美关系的走向,首先涉及对未来国际环境和中美力量对比变化的判断。当前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国际力量结构的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导致了美国优势地位的弱化和主导世界事务能力的下降;国际和跨国问题增多,需要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各主要力量中心的合作;着眼于合作与协调的国际规范和机制进一步发展,对各国政策的制约和导向功能增强,强国凭借实力优势推行单边主义的空间在缩小。因此,国际形势总体上需要中美两国加强合作与协调,这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从力量对比看,虽然美国仍将在综合国力上遥遥领先中国,但在中国预期能够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态势的情况下,两国的力量差距会不断缩小,^[8] 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拥有越来越多的可资利用的资源,两国关系的不对称性下降。这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的议程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议题，如人权问题，不扩散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市场准入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困扰着双边关系。展望下一个 10 年甚或更长的时间，随着国际形势以及中美各自内外政策的变化，以下新的议题有可能在双边关系的议程上凸现。

首先，随着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并越来越为世人所肯定和借鉴，中美之间的发展模式之争可能会变得突出。这种模式之争，不管是称之为“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抑或“专制资本主义”对“自由资本主义”，反映了美国对后冷战时代推广其制度和价值观受挫的焦虑和不安。为了推广其情有独钟的发展模式，美国的一些舆论和政策精英有可能打着“捍卫民主”的旗号，在美国和西方唤起某种意识形态的狂热。^[9]这种发展模式之争将有可能取代后冷战时代中美在比较狭隘的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纠葛，上升为冷战式的制度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

其次，中美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格局之争可能会显山露水。随着中国在本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和积极推进各种形式的地区合作，中国在地区格局的塑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长期以来把对亚太地区事务的主导能力视为其在本地区利益的一部分，因此极力提防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上升。近年来，美国已直言不讳地对中国在地区事务中扩大的影响力表示担忧，并谋求通过其在本地区的盟友来牵制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中国在地区格局塑造中作用的上升，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牵制力度会相应的增大，手段上也会有新的变化，中美在本地区的竞争态势有可能会进一步凸现。

第三，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也会成为中美之间新的纷争之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政治交往不断加深。客观地看，中国与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有助于该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但是一些保守的美国观察家却抱怨中国进入这些地区与美国竞争经济和政治利益，指责中国为一些所

谓“无赖国家”、“独裁政权”撑腰，使他们更有恃无恐地挑战西方的价值规范，更有甚者，要中国对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冲突负责。凡此种种，预示着伴随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利益联系的拓展和影响力的扩大，中美在某些地区的经济、政治、战略利益上的分歧会有所加剧。

第四，随着世界范围内对能源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关注力度的增大，未来的美国政府将不得不调整布什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保守立场，将它们置于美国外交日程上更为优先的位置。当美国对环境保护、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时，这很可能预示着中国将会面临来自华盛顿的更大的压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但另一方面，能源和环境的制约会越来越强烈，而来自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只会加剧这种制约。在某些情况下，中美之间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可能会变得尖锐化。

此外，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中美关系将不可避免出现多边问题双边化的现象，中美在双边问题上的分歧会反馈到双边互动中。这些有可能困扰中美关系的问题包括：应如何推进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联合国该如何重新确定对主权国家内部问题的干预形式和力度？如何确定新的世界贸易规则？如何推进国际军控和裁军？如何防止外空的武器化？等等。随着这些问题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议程上的突出，中美双边议程也会产生“共振”现象。

在见证了建交 30 年来双边关系的曲折历程，尤其是经历了后冷战时代混合着竞争与合作的复杂互动后，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都有了新的认识。就中国而言，它对中美关系变得更加自信。这种自信首先来自对中国自身发展前景的信心，中美关系要搞好，关键是中国自身的良好发展。30 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过去 30 年的物质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会更加广阔。这种自信也来自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判断上。在经历了后冷战时代民主、共和两党两届政府轮流执政后，中国得出的结论是，中美关系归根到

底是靠共同利益推动的。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迅猛发展意味着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会越来越多,合作空间越来越大,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也将越来越强劲。另一方面,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也更加现实。美国的政治结构及其运作规律决定了美国国内政治将不时地困扰双边关系,给双边关系制造杂音以及具体的障碍。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成长及其战略意图的关注将长期存在,对华防范和牵制也会成为制约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美在其他方面的分歧,结构性的和非结构性的,物质利益的和规范利益的,等等,都会继续存在并导致两国关系的无规则波动。对两国关系的现实认识有助于避免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抱不切实际的期待,并理性地处理两国关系中经常性和突发性的问题。

对美国来说,其对华政策正在变得更加务实。华府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而只能加以“引导”;美国不能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或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压力所产生的效果是有限的;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有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那就是美国不能支持台湾独立。^[10]美国大多数的政策精英相信,中国现在并不是美国的敌人,也无意寻求与美国对抗,而明智的对华政策就是要确保两国今后也不会走向对抗。他们也认识到,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越来越取决于中国的合作,因此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对华政策就是扩大中美合作。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两党分歧正在缩小。这一点在 2008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表现得很明显。当选总统奥巴马认知中美关系的基础是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强调需要谋求中国的合作来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11]

另一方面,美国仍对中国的发展感到不确定。^[12]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将如何实现其目标?中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前景如何?中国将怎样面对复杂的国内问题的挑战?中国的对外意图和行为将如何变化?中国将如何发展其军事能力,又将如何使用它?怎样看待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复杂影响?等等。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主要就是围绕着如何认识这种不确定性以及怎样在政策层面做出反应所展开。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之间、府会之间、温和派

与强硬派之间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的不同解读。

世事如棋局局新。从冷战时代战略大三角架构下的准同盟关系到全球化时代的利益攸关方和建设性合作者,中美关系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其时代内涵。中美关系的演变,既是国际环境塑造和两国利益互动的结果,也是两国的决策者不断思考、探索和调整的结晶。从国际政治的大背景看,21 世纪的中美关系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以及地区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的贡献,更在于要摸索出一条新兴大国与现存大国和平共处、互利合作之道。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注 释:

[1] 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参见吴心伯,“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格局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复旦学报》2007 年第 1 期,第 1—10 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编,《中国外交》,2006 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出版,第 254 页。

[3] 参见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8—109 页。

[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06*, “Executive Summary”, p. 1.

[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6, 2006, p. 29.

[6] 上述数字根据 1991 年至 2008 年 12 月《人民日报》的报道统计得出。

[7] 温家宝,“继往开来,共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晚宴上的演讲”,2008 年 9 月 23 日,纽约,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wjdt/zjyh/t471276.htm>.

[8] 例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 2035 年赶上美国,并在本世纪中叶达到美国的两倍。Albert Keidel, “China's Economic Rise—Fact and Fic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olicy Brief 61*, July 2008.

[9] 关于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参见 Azar Gat, “The Return of Authoritarian Great Powers,”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4 (July/August 2007), pp. 59–69; Robert Kagan, “The world divides… and democracy is at bay,” *The Sunday Times*, September 2, 2007; Harry Harding, “Blazing a New Trail,” *China Security*, Vol. 4, No. 2, Spring, pp. 7–8; Condoleezza Rice, “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4 (July/August 2008), pp. 2–26.

[10] 例如,布什总统在 2008 年夏来华参加北京奥运会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两岸关系“对中国政府而言非常敏感”,“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红线,那就是(台湾)不能单方面宣布独立”。“Roundtable Interview of the President by Foreign Print Media,” July 30, 2008, 白宫网站,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8/07/print/20080731-7.html>.

(下转第 30 页)

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拖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因素。可以预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分歧将长期存在,两国未来军事关系的发展还会遇到许多困难,能否保证两国军事关系稳定发展,未来主要将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美国在安全战略上对中国如何定位。中美军事关系发展的障碍主要来自美方。因此,两国军事关系能否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方在安全上对中国如何定位。30年前,美国将苏联视为主要战略对手,将发展对华军事关系看作是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重大战略举措。在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上,中美矛盾下降,双边军事关系因此获得了稳定发展的基础。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两级格局的解体,美国对华战略的政策基础发生了变化,将发展对华军事关系看作是对华接触政策的一部分,致使军事关系长期落后于两国总体关系的发展。布什政府执政后期,在战略上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利益相关者”,双边军事关系随之进入到了相对稳定时期。未来中美军事关系如何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民主党在“美国需要变革”的旗帜下,赢得了美国大选的胜利。奥巴马入主白宫,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进行新的调整,今后在解决重大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美国可能会更加重视国际合作与大国协调,从发展趋势看,推动中美军事关系稳定发展的积极因素在增多。

二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在中美军事关系中,除台湾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干扰因素不容忽视,即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美国政府、国会及一些智囊机构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疑虑,对中国正当合理的军事需求抱有很深的偏见,因此主张在亚太地区编织防范围堵中国军事力量的网络,这一意图清晰可见。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所做出的各种各样的评估实际上只有主观

标准,很少有客观标准,这严重妨碍两国正常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在两军交流中,不时利用“军事透明度”、“对等互惠”等问题对中方施压。总之,未来中美军事关系能否稳定,美国如何认识中国正当的安全需求和军事能力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三是如何应对各种偶发因素的冲击。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两国军事关系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决定了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中的危机管理问题,直接来源于两国军事关系发展的需要,今后受到类似因素影响的可能性仍不能排除。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多年的磨合,两国对预防和处置可能出现的危机事态,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多层次战略对话、军事热线等为主的危机处理机制,为保证两国军事关系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美建交30年,两国军事关系历经曲折。但是,在两国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大格局之下,两国军事关系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双方只要面向未来,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着眼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保持两国军事关系的相对稳定是可以期待的。

注 释:

[1] 袁鹏:“战略互信与战略稳定”,《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一期,第30页。

[2] Shirley A. Kan “U.S.-China Military Contacts: Issues for Congress”, August 20, 2007.

[3] 罗援:“中美军事关系在曲折中向前迈进”,《北京周报》,2006.08.07。

[4] John D. Negroponete,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Washington, DC May 1, 2007.

[5] Joseph C. Anselmo, Douglas Barrie & Robert Wall, “Last-Minute Negotiations To Avert U.S.-EU China Arms Embargo Rift” 《Aviation Week》, Mar 6, 2005.

[6] 袁鹏:“战略互信与战略稳定”,《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一期,第36页。

(上接第15页) [11] 奥巴马和麦凯恩都曾在美国《外交》季刊撰文阐述各自的外交理念。奥巴马在谈到对华政策时表示,“我也会鼓励中国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在应对21世纪的共同问题方面起带头作用。我们在一些领域与中国竞争,而在另外一些领域与中国合作。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建立既能扩大合作又能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的关系。”麦凯恩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中国和美国并不注定成为敌手。我们有众多一致的利益。美中关系能惠及两国、亚太地区

和世界。”——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4 (July/August 2007), p. 12; John McCain, “An Enduring Peace Built on Freedom—Securing America’s Future,”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7), p. 29.

[12] 参见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中国安全》季刊于2008年初推出的一组文章:“Debating China’s Future,” *China Security*, Vol. 4, No. 2, Spring, pp. 3-26.